

庆祝建党百年有感

○李 刚（1948届机械）



李刚，曾任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第四任厂长，20世纪80年代任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、董事长等职，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孕育、诞生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。

我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党的关怀下已经度过了71年。在这71年里，党把我由一个学生培养成无产阶级战士，引领我走上一条又红又专的道路，终身奋战在祖国汽车工业建设和发展的伟大事业中。在建党100周年之际，我衷心感谢党的培育之恩。

1958年，毛主席说：“我什么时候能坐上自己国产的轿车？”同年5月，我们“一汽”把一台试制成功的“东风”牌轿车送到北京，停放在中南海怀仁堂旁边，供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参观。5月21日下午，毛主席来到小花园停车场参观，并同林伯渠一起乘车绕花园两圈。毛主席高兴地说：“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轿车了！”但我知道，苏联斯大林坐的是比“东风”牌高一级的“吉斯”轿车，为了

赶超苏联，我们立志造一台高于苏联的“红旗”轿车。此后，“一汽”全厂职工在“乘东风，展红旗，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”口号的鼓舞下，立即掀起“大战红旗高级轿车”的群众运动。由于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大家就打破常规，用“赶庙会”的办法张榜招贤。“红旗”轿车的2000多个零部件的任务，不到几个小时就被大家抢光。

在“大干红旗轿车”的热潮中，全厂组织了323个突击队，攻克一批生产关键和质量难关。当时我在发动机车间技术科，厂领导叫我组织以我为首的液压挺杆攻关突击团队，当时命名为“101突击队”，并且组织成立了实验室。这项任务非常光荣，但也很艰巨。突击队的任务核心是为“红旗”高级轿车消除发动机的敲击声，造出静音的液压挺杆。于是我广集人才，组织了由铸造分厂的工艺师、设计处的工程师、工具分厂的模具工程师、加工生产的工艺师、产品设计师，还包括数十名技术工人组成的攻关团队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我深知自己肩上的使命。我以身作则，和大家一起奋战在生产第一线。我们集思广益，日夜奋战，反复实验，并且赴相关单位考察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，采用几十种加工方法、加工技术和生产材料，最后制成了合格的液压挺杆，经受住400小时的耐久性台架试验。当时苏联没有制造液压挺杆的技术，他们的挺杆和凸轮轴之间还有敲击声，于是向我们国家提出对这项技术的需求，我们就无偿

地将这项技术交由苏联专家带回苏联。我感到非常自豪，我们终于解决了红旗轿车的技术关键难题，拓宽了汽车工业发展的道路，为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现在，我已是一耄耋之年，但我仍然没有忘记当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，要永远跟党走，继续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。

无问西东 奉献一生

○ 缪 桂（1962届无线电）



1962年9月30日，缪桂学长（左）结婚照

2021年，欣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，有66年党龄的我，真是心潮澎湃、激动万千！记得1955年在江苏省南菁中学高中毕业前，我作为优秀生加入了党组织，1956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（六年制），1962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直到退休。

20世纪60、70年代，我在青海221核基地工作，参加了新疆戈壁滩现场的两弹试验。80年代在四川902基地为筹建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的计算机网络系统，担任课题负责人，建成全所计算机网络系统。90年代在绵阳九院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工作，担任中物院计算机网络研究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等职，曾获国家特殊津贴、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称号。

近60年的工作生涯中，我始终不忘母校的教诲，履行了一个清华人的责任，下

面算是我的汇报。

投身原子能事业

我是1962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（后改为电子工程系）。我爱人华欣生1961年下半年从苏联留学回国，1962年9月30日我们在北京北太平庄的九院结了婚。

毕业后，我立即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（原名九院）报到，被分配到老三室，室领导是胡仁宇、赖祖武。马上又被安排到北京中关村原子能所（11室），室领导是李整武、谢家麟先生，参加毫微秒脉冲加速器的合作研制项目（国内属于空白）。我被分配研究设计毫微秒脉冲加速器探头部分，属于脉冲中子源范畴，为冷热试验标定工作服务。对于核物理技术缺乏的我，难度太大。当时正处于九院初创时期，没有经验可借鉴，只有加班加点，埋头苦干，白天上班时间去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，晚上在办公室苦苦钻研到深夜，乘31路11点的末班车回家。第二年，我们转到北京郊区房山坨里原子能所二部（401所，现中核总原子能院）工作，离家就更远了，一星期只回一次家，来回十分辛苦。但我们都意志坚定，一心要把“争气弹”搞上去。正如陈能宽院士描述：“八百年前陆放翁，一生但愿九州同。”